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劫后反思】	批判者和被批判者	洪子诚
【往事非烟】	许广平在“文革”中	周海婴
【史海钩沉】	文革知青读书暗潮与习近平书单	彭小明
【一家之言】	我在文革漩涡中（选载之三）	聂元梓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劫后反思】

批判者和被批判者

• 洪子诚 •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这很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径自离开。下午2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推开他们通常开班会的房门，发现全班三十几位同学都已挤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陷于慌乱之中。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作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团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小姐的”。发

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可能是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直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且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和社会心态，钻牛角尖地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寻找合理的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种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过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全消除。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10月底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在走之前的一天，在19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58、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纪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荟萃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瑶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们班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1949年以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领导”、“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学习周扬总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找《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们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研究》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目是《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字，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了。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形式，把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授。王瑶先生讲头四讲，记得有五卅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吃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的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性。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不知所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的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时文”。而我们50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

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过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80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年路程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附记：应校方宣传部门之约，本文写于1998年北大100周年校庆前夕。但被退回而未采用。）

□ 节选自《家住未名湖》（北大记忆丛书），么书仪、洪子诚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

## 【往事非烟】

许广平在“文革”中

• 周海婴 •

作为鲁迅后人，我对于三十年代文艺界前辈们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虽然父亲曾经跟他们中间一些人有过这样那样的事，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至于有人后来为此而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乃至迫害，那应该不是父亲的责任。没想到个别前辈不作如是想，不但旧恨未消，竟在全国声讨“四人帮”之际，将自己受迫害的责任加在已故母亲身上。

事情起因于“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近代组的一次分组会。这次会议参加者中有欧阳山、林淡秋诸位前辈。会议主持者是孟繁和、王宝生两同志。就在这次分组会上，前辈李初梨说：“鲁迅算什么！郭沫若提出革命文学的时候，他还在喊虚无主义呢！”还说：“许广平不是什么因鲁迅书信被拿走气死的，而是因为她与王关戚关系密切，王关戚一揪出来，就吓死了。”

对于父亲鲁迅的评价，各人看法不同，这原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母亲的无端指斥，我觉得这位前辈不仅太伤人，失之于厚道，简直是在信口污蔑人。关于母亲亡故的原因，我将在后文述及。这里先说明几点情况。

◇ 江青召见许广平

不错，母亲早就认识戚本禹。那是1962年初，她收到戚寄自中南海秘书室的一封私人信件，大意是他读了母亲的《鲁迅回忆录》，有一些感想，打算写一篇《鲁迅与群众》的文章，因为“毛主席说过，鲁迅是最平等待人的”。为此希望母亲提供一些材料，“我想拜访您一次，请您给我一些指示”。母亲对人一向是热情的，她答应与之交谈。戚来访的那天，我正在广播事业局上班。但事后知道，他就有关鲁迅研究提了几个问题，母亲一一作了

答复，仅此而已。就这样，她与戚本禹算是认识了。戚的这封信至今还留存着，很简短，日期是1月14日。此后便再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1966年5月下旬，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正休息在家，戚本禹忽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来面谈。来到我家后，他只简单地传递一个讯息：江青要母亲立即到上海去。至于去上海干什么，他没有明说，只讲“到了那里就会知道”。并说此去逗留的日子不会长。他知道母亲有心脏病，让我陪侍同去，以便有个照应。我插问一句：如何请假，向哪一级请假？他回答说，请假的事，我们会替你办的。他回去不久，便送来两张当日上午的飞机票，我们就立即动身出发。

从上海机场出来，便有上海市委交际处的人来接，汽车一路开到了锦江饭店。房间似乎早就定妥，是远离旅客的第10层。客房为单间，放有两架单人床。接待的干部交待：不要下楼、外出、打电话。吃饭自会有人按时送到房间来，每餐都在房间里吃。临走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事可以打电话给他。

打从接到通知，我们母子俩就一直处在满心狐疑之中，因此到了饭店，母亲就和我猜测，到底召我们来做什么？为什么那么急迫？又弄得如此神秘兮兮的，竟连房门都不让我们迈进一步？好不容易忐忑不安地挨到傍晚，那人来通知，让我们到楼下的锦江小礼堂去。他把我们领入落座后，便即告退，这时忽见这空旷的窗帘密封着的大房间里端坐着一个人，她就是江青。

江青开口先道了辛苦，随后突然问我母亲：你要不要给鲁迅伸冤？我听后感了一惊，并从母亲表情中看到，她也对这句话大为震惊。江青接着说：你们把笔收起来，不要记录，这次请你来，是让你把三十年代的冤屈吐一吐。本来想想算了，由你去了（我当时想，这大概是你们虽然无可救药，但是还给个机会之意吧——海婴注）。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么冤屈都写下来。什么时候写好，交给工作人员。接着笼统地讲了几句形势。还说我们这次被召来上海，中央是知道的。我们一头雾水，丝毫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心里又紧张，也不敢提问什么。末了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不要出这个楼，不要找这里的朋友，外边不安全，也不要向外打电话，这件事对谁也不要说。交待过这几句，便起身送我们走了。

母亲和我恍恍惚惚地返回房间，晚餐送来了，但我们自始至终不知在吃些什么。饭后，母亲跟我说：父亲在三十年代是有气的，这些都在他的文章里表达出来了。他的病和死，我们是有疑问的，连叔父周建人一直也在怀疑。只是讲到“冤屈”这层意思却又从何而来？不知道江青所说的“冤屈”究竟指的是什么？又是怎样程度的冤屈？真是难以捉摸！这天晚上，我见母亲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没有睡好，想必是整夜在搜索枯肠吧。我理解母亲的苦衷，虽然她内心不愿意，但是既已应召而来，看来不交出点什么，是断乎过不了关的。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员送来四份中央文件，说是只准看不许摘抄。文件之中记得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母亲和我急匆匆地读了一遍，除了觉得江青所讲的形势原来都是文件里的内容，还仍然如在云雾里弄不清底细。只觉得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要紧张紧跟。但这些都来不及细细捉摸，眼下最重要的是回忆和写出材料来交卷。母亲经过一天苦苦思索，叫我铺开纸，由她口述我记录，就这样边忆边写边擦汗，搞了一天。到晚上，母亲疲惫地擦拭着额上的虚汗，表示再也挖不出什么“冤屈”来了。我又不能帮她什么，只能暂停休息。随后，母亲将我记录的稿子拿去修改，直到深夜才完成。次日由我誊抄，成稿10页。材料前附了半页给江青的信（短信括号里的字是我添加的，得到母亲的认可）：“感谢您借给我阅

读的（四份重要）文件，现在看完了（懂得不少事，真觉得必须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特此奉还。这几天有关三十年代的前后回忆了一番，搜索枯肠，只记得了这么一些（没保留写下），不知能供您参考与否？若有不妥处，希望把意见指出，以便修改。”

母亲把这份材料封好交给工作人员，同时向他提出要上街走走。离锦江饭店仅几百米的霞飞坊，是我们曾经住过十几年的地方，而且至今我妻子的父母兄妹仍旧住在那里，怎能到了上海而不去看望呢！说到不安全，我们想不通会发生什么事。中午有了回音，只允许到友谊商店去购物。无奈，我们在一位交际处管接待的女同志陪伴下，也可以说监视下在友谊商店二楼逛了一圈。里边冷清清的，只有几个“外宾”在购物。这大概就是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吧。母亲买了一块广东香云纱衣料，我给妻子挑了一件雨衣，不敢多逛，便匆匆打道回旅馆。

隔了一天，又通知见“首长”。仍是这个地方、这个阵势，边上仍然没有旁人，空空荡荡，只有江青在座，她开门见山讲：“材料看了，时间嘛已经过去很久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也许你知道得不多。那你马上就回去吧！我叫人去买飞机票。这次来上海不要告诉别人。”

#### ◇ 对成仿吾谈话的看法

在这风平浪静的1966年5月，我们母子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急匆匆而神秘兮兮地去做了一趟上海，领受这样一个特殊的任务。对于母亲奉命写的这份材料，我一字不漏地予以公布，此中的是非曲直，我不想多说什么，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结论。而对于我来说，重读旧文，感慨万千，不禁又忆起当年母亲苦思冥想时的烦恼和无奈。

从这次神秘的上海之行后，我发现母亲有些变了。在去之前，她似乎也感觉到政治形势逐渐变得不可捉摸，却又什么都不知道。她虽是党员，又有人大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等显赫头衔，但能让她接触的中央文件却不多，平时只能通过报纸和大参考来了解形势，有时还靠“马路新闻”来补充。她内心只有一条：虽然自己年老多病，仍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时时事事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因此，尽管那时她的心脏病已很严重，但只要心率稍稍正常，心绞痛和缓，便要拿起报纸来看，重要的段落还要亲自加以抄录。她常常独自默默地在想着什么，说话似乎也少了。另外，也许出于一种特殊的心理，她还重抄了《风子是我的爱》等两三篇文章（直到她去世前的1968年1月21日，母亲才向我们透露，这篇《风子是我的爱》，是她向父亲的定情之作，她解释说：风就是快、迅，指的就是父亲鲁迅——海婴注）。

同年7月初，有一天全国妇联接待室来说，山东大学四年级的学生王永升等几人，要求面见母亲，了解她对成仿吾的看法。他们提了这样两个问题：一、对成仿吾的看法，你在《鲁迅回忆录》里和现在有性质的不同，为什么？二、1958年你与成仿吾的谈话内容。

事情的起因是1959年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访问山东大学时，有一份成仿吾校长的讲话记录稿。当时彼德罗夫问他：革命文学争论时期，杜荃（即李初梨——海婴注）等人为什么要猛烈批评鲁迅？成仿吾回答说：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是后一辈，彼此有些矛盾。我们对鲁迅不满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皆抛离广东，而鲁迅却前往广东，他是被朱家骅利用，做了广东大学的教务长，这是他落后处。直到他后来发觉，才回上海。太阳社“左”得厉害，创造社态度比较中间，李初梨批评鲁迅针对的仅是鲁迅留在广州这件事。

“当时与鲁迅进行理论斗争是有的，但与鲁迅对立的是太阳社，鲁迅把我们和太阳社混为一起了。一九三一年鲁迅说我们是流氓（我们皆已入党），这是错误的。但从那以后，鲁迅转变了，对我们很好了，一九三一年底，我从苏区（湖北打游击）到上海找党中央，鲁迅帮助我们找到党中央，见面很高兴。去年我见许广平，向她感谢鲁迅的帮助，许广平说：‘鲁迅的错误很多’。”

对于成仿吾的这次谈话，尤其是向外国人士这样讲，引起了学生的疑惑，为此，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澄清。

对于这种事关历史真实和父亲名誉的大事，母亲理所当然有权予以说明。

她的答复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鲁迅从厦门写信给我（当时我在广州）说：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联合战线，更向旧的社会进攻。当时，鲁迅因为‘三·一八’运动，被北洋军阀追捕，离开北京不久，他急于寻找战机，联合战友，才想到广州去参加战斗。因此一九二七年一月，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但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开始大屠杀。鲁迅当日不避危险，参加紧急校务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他就坚决辞职，表示抗议。成仿吾说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后才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是篡改历史，有意诬蔑鲁迅。我在北京见到成仿吾时，的确提到这件往事，那是我向他打听：他是否秘密地到过上海？他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说明他是通过鲁迅才和党接上关系的。当时我并没有说过什么‘鲁迅也有错误’这一类的话。”

可以看出，母亲的回答仍旧心平气和，仅是据实说明真相而已。后来山东大学的学生将之作为批斗成仿吾的炮弹，那是母亲始料不及，也是她不愿看到的。

#### ◇ “文革”中的波澜

事实上，在“文革”中，母亲一直关注和同情李初梨的遭遇。当时我们住的景山前街7号与李初梨隔壁相邻，得知李家遭到抄、砸，破坏严重，她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同时也开始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和我商量怎样避免红卫兵闯进我家来造反。按当时的风气，惟一的办法就是高挂、多挂毛主席像和语录。因此一时间，我们家里的镜框都覆盖了毛主席语录，家里的“四旧”属于我的不少，为了避免讲不清惹来祸害，遂将我日常摆弄的那些无线电零件、电子管、外国古典音乐唱片统统交给我的大孩子去砸。叮叮当当敲了半天，统统砸成碎片才罢休。还有孩子们喜爱的小人书、连环画册和外国童话故事书，全卖给了废品站，为此他们伤心了好几天。院子里原来种着好些耐寒花木也统统挖掉，改种向日葵、玉米和蓖麻。每逢母亲要外出，我们怕她年老遗忘，总要检查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是否佩戴端正，“红宝书”是否放在随身小拎包里。这是家里人谁都有责任做的检验工序。我们临街的大墙原来光秃秃的一色青砖，没有大标语，我们怕革命警惕性特高的红卫兵产生怀疑，冲进来责问，就赶紧去买红色的油漆，刷了“毛主席万岁”大标语，心里才踏实下来。

在这惶惶不安的日子里，母亲的身体愈加衰弱，经常心率过缓，心绞痛频频发作。不想就在此时，被造反派夺了权的北京医院，竟将她的医疗关系，跟领导干部和所谓“资反分子”一道驱逐了。她被转到设备较差药品供应又不多的北大医院去就医，以致后来造成令我悲痛终生的后果。

□ 摘自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

~~~~~  
【史海钩沉】

文革知青读书暗潮与习近平书单

• 彭小明 •

◇ 波澜壮阔的读书大潮

在文革回忆录的文字中，不少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有一场青少年自发的读书热潮。由于地域广阔又漫无组织，至今还没有人比较系统地予以总结和梳理。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1949年共产党建政以后，立刻开始了对意识形态的监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部报刊都收归国有，在两三年内，比其他工商业更早地实行了出版业的公私合营国有化。由此禁绝了政治的异议，限制了宗教的传布。中共中央宣传部查禁了所有非官方出版物，也禁绝了许多学术著作例如《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著作和非主流文学；但是顺随苏共的文艺政策，对于中外文学名著还是基本开放的。五十年代可以看到三国、水浒、红楼梦，但看不到《金瓶梅》《荡寇志》《粉妆楼》，可以买到莫泊桑、狄更斯、泰戈尔的译本，但买不到《基督山恩仇记》……到了1963年毛邓反修高潮，苏联意识形态也成为禁区，于是中国的出版界和读书监控进一步进入寒冰期。大约在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的1963年开始，学生青少年因读过一些党团组织不提倡的书而受到批评处分，被鉴定为思想有问题的情况，各地都有发生。

1966年文革开始，除了颂毛（颂党颂军颂英模）歌曲之外，所有的电影戏剧等娱乐活动全线停止，所有的中外文艺作品，包括1949年以后的小说散文，几乎全部都是“毒草”，或“存在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书店陈列的除了毛语录和毛诗词，就是少数马列经典或鲁迅作品。其他都是禁书。在批斗、抄家、打人、抓人、烧书、捣毁文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期，全国一片肃杀，万马齐喑。

1968年各地城市知青大规模下乡，全国知青悄然汇成了一场自发的读书热潮。没有任何人发起，完全是自然的追求。不论是一部分留城工作的青年，还是下乡插队或农场工作的知青，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了书籍。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的青少年读书暗潮。因为人数众多，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将近千万（文革下乡总人数超过1700万）的青少年竞争先恐后阅读一部分世界名著，而且简直是如醉如痴，这是怎样壮观的文化热潮！但是它又是隐秘不敢公开的动作，大家心知肚明，私下交换，所以只能称之为暗潮。农村田边地头，灶旁炕边往往就有一本英国的《呼啸山庄》或者法国的《九三年》。在青年工人的挎包里或探亲回城的知青行李内夹着一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因为是非组织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能读遍所有流传的好书；也因为没有人指导，也缺乏参考书籍，所以阅读的质量和收益也深浅不一。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每个读者的文化程度和思想修养不同，所以读后的效果也是千差万别，乃至形同霄壤。

◇ 读书暗潮的原始动因

读书暗潮的动因应该很多，第一，国家经济停滞，城市无法安排中学毕业生就业，农村的社队更加不需要劳力，所以知青参不参加劳动，基本无所谓。反正绝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要靠城市父母供养。这样就让知青有相对的空闲时间。第二，全国的文化生活极度枯寂，农村尤甚。当时电视机远没有普及，城市收音机普及率也不高，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

宁在1918》，《地雷战》和《地道战》。文革中后期才有新的电影《青松岭》。农村地区的拉线广播都是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出现的。传统的戏曲因为地方剧团被合营或取缔，民间小戏必须接受文化馆管控，此时因文革而禁绝，村镇自发的民歌活动则更因为涉及“情郎妹子”等色情而被禁止。庙会、集市、社戏等民俗活动早已停摆。此时的中国农村文化生活到了历史上最为枯寂沉闷的境地。知识青年虽有高中初中的区别，毕竟大家都已识字，可以读书。书中的世界，无远弗届，海阔天空，可慰寂寥，更长知识。闭关锁国的滋味非常枯涩难忍，翻译的作品总能提供一些世界知识。一个知青集体户若有了一本什么书，一直要把它翻烂为止。第三，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助力量，那就是违禁心理。当时的文化政令极左，所有过去的文艺作品，拿毛江两次文艺座谈会理论来衡量，都是封资修的大毒草。都不准青少年接触。文艺心理学告诉我们，越是查禁的违禁书刊越能吸引人去阅读。当时的青少年也抱持这样的心理态势，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好歹咱也是个大人了。这也不准，那也不准。一旦有书在手，偏要看个究竟。第四，求知求解。经历了文革的混乱再下乡，城乡差别非常大，现实的社会生活向知青提出了无数的疑问。收入、口粮、工分、集体、劳力……都得不到可靠的答案，看看书中的历史人物是怎么生活的，是怎么探索的，或许能有一些启发。第五，青春期的生理饥渴和爱的饥渴。经过了文革风浪的冲刷，下乡的知青都开始进入青春期。五六十年代的教育不包含任何性教育的成份。一般的父母也都对此讳莫如深。知青们无法回答自己的生理提问，书本应是最易于找到的咨询。文革时代充满了斗争和打杀，无论城乡都缺乏爱的关注。知青却在书本中找到了一些爱的宣泄，于是便爱不释手。

◇ 大致的分类

不是说文革抄家打砸抢，焚书毁书吗？哪来的书可以看呢？扫荡总有漏网之鱼，而且还不是太少。抄家并不一定立刻就焚书。街巷中点火容易发生火灾。多半是将一些字画和所谓罪证书刊打包带走，其余书籍则封存不准移动。据说不久有人建议，不宜再烧，不如集中化为纸浆，再作原料。有的被抄出的书刊被集中到学校或红卫兵总部。由于管理混乱，除了金银首饰以外，“抄家物资”中最容易失窃的是西洋美术和摄影画册（含人体艺术，被称为黄色书刊）。反而那些比较厚重的文学和学术书籍后来逐渐成为爱读书的青少年们分享的猎物。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学研究中心主任宋镇豪教授当年就是在即将焚毁的书堆里趁人不注意抽出了一本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数十年后，他成了当今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历史的学术中坚。近年披露的消息说明康生、林彪、江青等人占有抄家物资中的文物古玩。各地八十年代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许多珍贵的书籍都已意外失窃。对于当事人或晚辈来说，还能看到一点大难劫余已属万幸，还有什么好说呢？

大潮中知青阅读的书籍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主要的，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除了三国、水浒、西游、红楼，《牡丹亭》、《西厢记》、《唐宋传奇》、《三言二拍》等中国古典，还有俄、英、法等欧洲古典名著。美国作家德莱赛的《嘉利妹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年近卫军》不太稀奇，西方不热门的《牛虻》是苏联捧红的，在知青中也很普及。多年查禁绝版的《基督山恩仇记》也在这时小有流传，严格监控的《金瓶梅》较难找到。除此之外，当时还传抄过民间手抄本小说《少女的心》（有部分性描写）和《第二次握手》。在那个枯寂沉闷的年代，也发挥过一点文学启蒙的作用。第二类则是灰皮书，色皮书。这是中国出版界持续四十年的一系列奇葩出版物。从五十年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开始，所有的单行本都没有个性化的装帧，或灰白，或灰蓝，或灰黄，只注明作者和署名；文革后出现了哲学、经济、史地……橘、绿、黄、蓝、赭等不同的封底色，乃至黑皮书（张国焘、王明和中共叛徒著作）。汉译丛书原是介绍马克思以前的学术文献的，后来也扩大了范围。最早的灰皮书《斯大林时代》揭露了斯大林统治下的饥荒和党内清洗等惊人的历史。不由得令人想起中国的三年饥荒和文革现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初心”是想用出版

苏联的文学和政治读物中文版以推动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斗争。却不料这些具有人性化描写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青年。

从抄家书刊中可能获得一些绝版的《金瓶梅》、《基督山恩仇记》之类的繁体书籍，其中的古典知识和奋斗精神各有千秋；但是从一些干部家庭流传出来的灰皮书则更富有思想性和现实意义。具有强烈现实主义传统的俄苏文学作品，《怎么办》、《罗亭》、《死魂灵》、《安娜卡列尼娜》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具有强烈的个性解放感召力，苏联作家的现实主义比中国作家更加大胆而直白，敢于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敢于描写现实中的干部特权，讴歌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伟大；（南斯拉夫吉拉斯的理论专著《新阶级》，思想很尖锐，但发行量极少）。欧美经典文献的基本主旨总是离不开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到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和《你到底要什么》，从卢梭的《忏悔录》、洛克的《政府论》，到科恩的《常识》和汉弥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其中的人道精神和权利意识都提醒读者，我们是人，有人的尊严，更有人的权利。这些令人觉醒的思想振奋过许多知青的精神，为文革结束之后的思想解禁和改革开放做好了热身铺垫。知青中涌现出了多名作家，恢复高考之后不少知青考上了大学或研究生，或者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人物。蓦然回首，都能从当年阅读禁书的热潮里找到发奋努力和振奋思想的萌芽和火花。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逐步接受人权概念，接受普世价值，提倡以人为本，也应跟当年知青一代的思想启蒙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因果关系。一个民族长时间地遭受严酷的禁锢诚属不幸；然而当中竟有一段时间发生了数百万知识青年同步认真读书的暗潮，不能不说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过，千万不要产生误解，以为那时候有什么“读书无禁区”的自由。关于十月革命的书仍然是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关于苏联历史的书仍然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这本史书是斯大林体制的百科全书，是篡改历史和个人崇拜的大杂烩，马列教条主义哲学的标准版。由于中共的反修斗争，才让中国人读到了如赫鲁晓夫的《二十大秘密报告》和《一个人的遭遇》等小说。对于中国历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和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都不可能进入国人的视野。读书的范围基本上仍然笼罩在五十年代禁书监控的氛围之内，所不同者，就是文革的混乱突破了一点党内所谓“内部阅读”的范围，让一大批知识青年接触到了较多的内部读物，灰皮书和色皮书。

◇ 习近平自曝书单

习近平在访问美英法俄的时候，一口气念一条长长的书单，自称读过多少多少本书。如此缺乏涵养，实在不敢恭维。此番作派分明是在举世瞩目的外交场合因缺乏自信而自曝浅薄，刚好反映出心理学指称的补偿心态：“此地无银三百两”。常言说，胸有诗书气自华。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明白，听其言，观其行，就大致可知其人的思想修养文化底蕴。自曝书单来自我显摆，人家就相信你饱读诗书了吗？说白了，习近平非常忌讳自己的软肋。他是文革老三届中上学最少的68届初中生，中学仅上了一年。（北京市八一学校，初一班主任陈秋影。）大学是清华，实际正是清华历史上最耻辱的工农兵学员时期，非经高考入学，被前校长蒋南翔谴责说，水平还不如文革前的中专生。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国家教委曾经认定为大专水平，未及本科；但是允许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习近平没有经过硕士入学考试和毕业，跨级入读博士本身就是违背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的。习近平博士学历的本身就是中国教育腐败、高校学风不正的典型恶例之一。习近平的学历公开以后，从2008年起就不断受到《开放杂志》等海外报刊质疑。中共十七大时期，官方网站悄然抹去了他在中央常委名单上的博士学历。十八大和十九大上他的权力巩固了，于是博士学历又赫然在焉。如此一缩一盈，刚好说明这种掺水学历是权力腐败的标志。

◇ 年齿尚幼识字少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习近平也是老三届下乡知青，应属文革知青读书暗潮中的一员。不过他入学早一年，下乡时不满16岁，理解和思考的成熟又会晚一些。读书的基本条件是识字。一般情况，上过几年小学中学，大概能认多少汉字是可以估算的。国内教育部门编制的《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规定，小学六年级学生要达到会认常用汉字三千左右，其中两千五百能写。国内的初中教科书（例如2011版初中语文课本）规定，一般初中毕业的语文水平是认识汉字三千五百字。那么没有毕业的初一学生认识多少字呢？高估一点吧，大概三千二百？根据数理语言学的电脑统计结果（参看陈明远编著《语言学和现代科学》172页），一个人学会了3700个汉字，才能通读一般的报刊文章99.9%，但仍有一些文言、科技和地名人名等生字，大意是可以明白的。1966年文革爆发，习近平仅念完初一，能认读的汉字不到三千二，国家语委《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六七千汉字大约一半还认不全。他离3700这个最低瓶颈还差大概五百汉字的距离。除了识字不足以外，由于干部子弟家境优裕，在社会认知方面也往往略低于平民子弟。习近平又比同届同学小一岁，在阅读和理解方面更要稍迟一步。看看报纸和青少年读物是可以的，但是要说在文革动乱的1966—1968年，他读懂了很多中外名著是不宜采信。倘若是繁体字本，读起来更加困难。习近平够不上优等生。他是1965年入中学的。当时不搞就近入学，而是考试入学。如果成绩优异应该进入北京四中、八中、101中或清华附中等名校，习近平成绩平平，因为属于军队干部子弟，就照常进入八一学校。

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习近平的家庭受到影响，不久发生抄家和扫地出门，搬进党校宿舍。他本人又卷入了联动组织活动，曾被警方关押遭人批斗，生活很不平静。其间阅读一些如《红岩》、《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之类的外国小说是可能的，也基本可以读懂。习近平的回忆文章说，文革抄家之后，他家搬进党校时，他搞到一本《三言二拍》，有的警句他说都能背诵。这本书半文半白，他能看懂多少？其中故事情节相信他若仔细看，还是可以明白的，比如“宽衣解带”、“撸起袖子加油干”等等，但是每篇皆有的诗词联语和一部分文言叙事就难说了。他的书单里还有《三国演义》，三国的原文比较简古，少部分干脆就是文言，还时涉历史典故；或许他看的就是三国的连环画，可以读懂，但是人名地名仍有不少生词。那时候，也可以找到不少翻译名著，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和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恐怕都嫌艰深，不易理解。当然，这时候的阅读也是一种补习，可以自学一些生字，增进知识。他认的字会逐渐增加。

1969年在农村，习近平谛听九大名单，父亲复出无望，他徘徊忧闷，染上了烟瘾。他不安心在生产队劳动，偷回北京，结果被再度关押将近半年。在少年管教所里除了朗读毛主席语录，背诵公安监管条例，绝无其它阅读机会。恢复自由以后，他去姑母家养病，应该可以阅读一些书刊，估计到了1970年后他逐渐突破了三千七百汉字的瓶颈。理解思想性很高、艺术性很强的作品就难说了。这时他的母亲齐心看到了关于大学到农村招生的中共中央文件，写信给生产队党支部要求督促习近平，也写信给他本人，要他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大约1970年下半年开始，习近平的情绪才基本稳定。

◇ 政治表现干扰读书与深思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16·7—2017·3）连续刊登了《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的报道。其中介绍了与习近平同时到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雷平生、雷榕生兄弟。兄弟俩专门谈到了他们的读书情况。倒是列举了三人当时共读的一些书目。因为兄弟俩是军队干部子弟，所以书籍多是军事著作。例如《克劳塞维茨选集》，《罗斯福见闻录》、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役》等，还有就是比较多见的《中国通史简编》和《斯大林时代》。其余则是当时各级党委都要求阅读的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其中连习近平从家中带来的1952年版繁体字《新编知识辞典》也提到了，偏偏就没有证实他书单中的那些资产阶级翻译名著。说来也是合乎逻辑的。

习近平的性格不属于青春浪漫型，执着而讲实惠。他和母亲的共同目标就是积极表现，争取得到推荐上大学。我们不要忘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书单里那些翻译名著无一不是禁书，是官方认为的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化渊藪。接触这些书籍就是一种消极甚至落后的政治表现。战史文献还可以说是有关革命战争，看那些人性论、人道主义的书，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了。虽然文盲村民不一定明白，但是多少还有回乡知青和并非全是文盲的社队干部往来接触。例如习近平曾经托一名社队干部带一封信给雷榕生，不料此人半路拆看了信件。信中竟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当时议论江青可是严重的政治大罪，为此习、雷一起送给此人一件军大衣作为礼物，请他封口缄默。这件事充分说明，即使是插队知青，当时政治上也得处处小心。作为争取推荐上大学争取入团入党的积极分子，习近平绝不会不注意自己的政治表现。犯不着为了看几本翻译名著、小资闲书干扰了母子俩配合默契的政治攀爬仕途。再说他回忆说，积极参加生产以后，整天累得精疲力尽，常常连洗脸洗脚都免了，是否读书也少不得要为政治表现让路。1974年入党前夕他被借调八个月担任另一大队的整改工作队队员。工作队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讲政策、讲路线，他还天天捧着一本什么人权、人性的翻译名著思考研究，可能吗？

1975年习近平进入清华。大学三年他能否阅读这些翻译名著呢？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是没有个人隐私的。七八个人同住一间上下铺寝室，一起上课，一起下厂开门办学，搞批判斗争。习近平担任班级党支部宣传委员，必须是政治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表率。当时的清华是什么氛围？领导班子是谢静宜和迟群，是毛泽东、四人帮红得发紫的极左打手。舆论上张春桥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喧嚣一时，作为清华工农兵学员、党员干部，他敢公开或私下里阅读那些法权、人权平等之类的翻译名著吗？他不顾及毕业鉴定里政治正确的评语吗？四人帮那套极左文化学术标准随着所谓的“继续批邓”一直断断续续到1977年，才逐渐被改革开放的热浪驱散。1979年四月《读书杂志》发表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以后，人们阅读一些资产阶级文献才逐渐不再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的表现。对于习近平来说，情况也一样，在大学期间他也不大可能阅读这些汉译名著。他上大学期间流行一些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如《热的血》、《落角》、《白轮船》等和美国戴姆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的书。都是党内允许阅读的。有人回忆说习近平在清华时向同学借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政治经济著作。那应该是快要毕业的1978年了。当时他表示不想毕业后从事化工合成科技工作。真是笑话！当初填报志愿，三个志愿都填清华，难道不知道清华是理工科院校吗？大概是他学习了三年化工，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理工科的特长，还是想回头从政吧？等到习近平毕业出任国防部秘书的时候，他已经25岁，跟第一任妻子柯玲玲结婚不久又离婚，早已淡出了青春时代而步入政坛。平心而论，作为中共高官，相对于党内休闲就时兴讲荤笑话的群体来说，他也应该算是比较注意读书的干部。但是这时读书跟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已有很大不同。

◇ 赤子之心和党政思维

青少年读书抱持的是一颗赤子之心，如果是优秀的作品，会与作者有心灵的交汇。人性和人道主义，普世价值会在交汇中往还震荡，陶冶读者的性情。罗曼罗兰的诤问：“人活着如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那还有什么意义？”会让读者立志追求真理；《忏悔录》开篇时卢梭的自白：“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会让每

一个秉持赤心的少年从此对自己的说谎意图提出冷峻的自责。在青少年时期，习近平应该会接触到知青读书暗潮的不少书籍。但是当他年龄稍长，识字渐多，开始读书和思考的时候，又过早地回归了党政体制（入团入党上大学），失落了赤子之心，顺随了党政的政治思维。因此当中国社会也开始议论人权和普世价值的时候，习近平竟斥责西方人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当全世界庆幸斯大林体制终于在苏联崩溃的时候，习近平叹息说苏共“竟无一个是男儿”！

据党校教师介绍，针对党政梯队接班人，地方和中央党校不断指定讲师安排一定的书目，给梯队接班人“讲读”。讲师选一本书，先讲内容提要，再选个别章节，分析点评之后，这本书就算读过了。这种读法，十年二十年下来书目一定相当可观。习近平当了多年的各级党政梯队接班人，书单所提到的那些西方翻译名著，正是八九十年代学界最为推崇的书目，讲师们也愿意推荐讲读。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和潘恩的《常识》，德国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还有不少翻译名著都是在习近平正式从政（从国防部到正定县）以后才有中文版的。不可能是他早年的读物。“讲读”过的名著，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读过，作者和背景他也大致都能说出；对他来说，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这些都是西方的翻译名著。既是西方名著，何不拿来列单展示？洋洋洒洒、附庸风雅的书单就问世了。孰料这些名著的深意皆是民主宪政的思想精华，刚好是当今中宣部需要打压封锁的普世价值！

（2018·4·23 世界读书日）

注：对于初中一年级生，较为难懂的文言举例：

- 1.却说韦皋久镇蜀地，自知年纪渐老，万一西番南夷，有些决措，恐损威名。上表固请骸骨，因荐遐叔自代。（《三言》982页，韦皋和遐叔是故事中的人名）
- 2.帝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议郎蔡邕上疏，以为蜺堕鸡化，乃妇寺干政之所至，言颇切直。帝览奏叹息，因起更衣。曹节在后窃视，悉宣告左右，遂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三国演义》第一回第一页，蔡邕和曹节是历史人名）

□ 来源：《华夏快递》2018年5月1日

~~~~~

## 【一家之言】

### 我在文革漩涡中（选载之三）

• 聂元梓 •

## 第五章 上海串连

### ◇ 毛主席要我去上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到校文革来找我，我正好不在。听在场的人告诉我：她见到了李玉英，把她带到了组织组办公室，在场的有孙蓬一、夏剑彖、李清崑、傅治文、陈葆华等人。李讷见到孙蓬一，开口就说：“孙大炮，你这门大炮怎么不放了？”接着就叫大家谈谈北大的情况，大家七嘴八舌讲了许多。最后李讷说：“北大的造反派不要只关心北大的运动，要放眼全国的运动。现在上海造反派正在受压，希望北大的造反派去支持他们，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今天来找聂元梓同志，就是想同她谈这个问题”。

陈葆华说：“原来我不认识李讷，傅治文、李玉英领她到组织组，说要我找聂元梓。李玉英说，我去找她。”陈葆华问李讷：“你找聂元梓干什么？”她说：“毛主席叫她去串连。”李讷还问：孔繁现在干什么？我们随便谈了谈。这时已到中午，大家到食堂打饭，留李讷吃了饭。

后来，校文革办公室人员告诉我：“李讷在范经家（李讷的历史系同学，历史系教师）陪同下来找我，没有找到，约好当天下午二时再来。”我和孙蓬一等商量了一下，在北大五院校文革组织组的一个带套间的办公室和李讷谈话，那里谈话比较方便。

下午，李讷准时来了，我们在校文革办公室谈了几句话，我就领她到五院组织组去了。因为上午李讷来过，没有找到我，许多人都知道李讷下午还要来，大家都希望能一起见见李讷，听听她带来什么好消息。李讷来先同大家（孙蓬一、姜同光、李清崑、李玉英、陈葆华、傅治文等人）在组织组的外间屋一块儿谈，随后李讷向他们告辞。我提出可否大家一块儿谈，李讷说要同我单独谈。我陪她到里间办公室，李讷对我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主席就问我见到聂元梓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今天，主席特意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什么，想些什么。”

我请李讷代我向毛主席表示感谢，并请她转达我对毛主席的请示。我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请示应该如何处理当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运动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我说，我正在抓设在陕西汉中的北大分校建设，别的工作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还请示了当时那些遭到群众冲击、在集中管理劳动的校系干部、教员和陆平等人怎么办？此外，我还对李讷说，全校学生和有些教员、干部都出去串连了，学校事情不多，我也想去外地看看，到上海串连去。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李讷没有表示什么，她说回去向主席汇报。

说实在的，陆平等人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大难题。陆平是工作组关起来的，他们撤走的时候，也没有移交给校文革。看管陆平的学生，一定要让校文革接管陆平，我始终不接收。我不知道把陆平接收过来以后，怎么处理他。因此，看管陆平的学生，一直是工作组当时安排的那些人。为什么不接收？我认为把陆平关起来就是错误的，虽然我牵头给陆平写了那张大字报，但我不主张对他采取那种激烈的行动。关他干什么？如果是因为有很多学生要批斗他，怕出问题，保护性关押还可以，可是，现在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了。工作组已经走了，陆平是不是还要关下去？但是，直接下令把陆平等人释放出来，我也不敢，上怕毛泽东批评，下怕群众说我不革命，顾虑重重。当时运动搞的轰轰烈烈，人们恨不得越激烈越好，越激烈越是能表现出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形势越来越左，我不敢顶着大趋势把陆平等人放出来啊。我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李讷代表毛主席来了解情况，我刚好可以请示一下，要是毛主席对这件事有个明确态度，是关还是放，我就有了行动的依据了。

正当我和李讷谈话的时候，发生了砸校刊事件。李讷到编辑部窗前观看了情况，表示很气愤。她对我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当晚，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也到了调查现场，指示我们要抓人）。孙蓬一、姜同光、李清崑、李玉英等人原来都在外间办公室等着，想听听李讷对我说了些什么新情况、新指示，因为校刊被砸，李讷说要去看看现场，谈话也就结束了。孙蓬一、姜同光等人问我她谈了些什么，我说是毛主席让她来的，我汇报了学校的情况，请示了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办法。我没有详细对他们说什么，因为李讷对学校的运动也确实没有传达毛主席的什么具体指示。

李讷第二次到到校文革办公室找我，是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仲钦告诉我，李讷来了，我迎接了她，办公室其他人也看到了。李讷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

谈，也看看你的家。当时，我住在北大三公寓。到家以后，李讷对我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展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连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我问，主席对学校运动和我请示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指示？李讷说，没有。主席就是说，让你串连去。她还说，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你北大搞也不行。

她的话当时是怎么具体说的，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大意是：北大运动不好再进一步做些什么，北大的运动要等一等，现在主要是推动全国运动的发展。李讷说这些话，没有说明是主席的意思，还是她自己的意思，但她使我领会，那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主席的精神。李讷又说，主席还叫我问问你，关于你和王任重的关系问题，要不要他为你说几句话，保你一下。我说我同王任重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他对我的指示都是关于北大运动和成立校文革的，没有什么错误。谢谢主席！现在不需要主席为我说什么，等将来我若有重大错误的时候，再请主席保我吧。李讷笑了：你真爽快！临走时，李讷对我说：到上海要带谁去，你们自己考虑吧，希望你们作出成绩。

李讷走后，我很高兴：这是毛主席给我的重要任务，也是对我的信任。为什么对我请示的问题和北大运动，毛主席没有指示，相反地，对我顺便提到的一个问题，他特意让李讷立即转告我，要我到上海去串连呢？对于毛主席特派李讷来找我谈话的目的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我进一步思考领会之后，决定立即执行。

当天晚上，我先对孙蓬一等人谈了李讷和我谈话的精神（既然李讷是找我密谈的，我不能全部按照原话传达给校文革的副主任和常委），说了毛主席认为上海和外地运动发动得不够好，同意我去上海串连，还希望我多走几个地方，以及北大运动要等一等全国形势的发展。我们第二天上午召开了校文革常委会，讨论怎样执行，谁同我去上海串连，谁留校主持工作。如果不是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并且是常委亲自看到李讷两次来找我），校文革常委也不会同意我这个第一把手到上海去，更不会让孙蓬一也同我一块儿去。没有上述理由，姜同光也不会接受我把学校的工作交给他主持。我们决定让孙蓬一、傅治文、陈葆华等人同我一块去。另外，还带了30几个红旗兵团的学生去上海。

当时，我和校文革常委们在思想里都认为，这是执行毛主席亲自交给的发动群众的任务，把上海的运动搞好，目的是反修防修。当时大家都清楚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毛主席自己还在天安门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和群众。只要说是哪里的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好，自然就想到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说的，五十多天来，不执行中央指示，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革命，以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等。我根本没有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和目的，一心想的是很好地完成党、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把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对北大同事和我个人来说，对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还有感激的思想和积极热情完成任务的心情，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我们的极高“荣誉”。这是当时发自内心的感情，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是很清晰的。

关于我去上海串连一事，智晴先生在其所著《文革初期聂元梓赴沪串连大有来头》一文中写到：

1966年11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李讷即肖力（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儿）在北大校文革组织组某成员的陪同下来到北大五院二层校文革组织组办公室。当时在校文革组织组

办公室的有孙蓬一等5、6人，笔者亦在其中。李讷身着军服，一见面就冲着孙蓬一说：“孙大炮，怎么听不见你放炮了？”原来文革初期孙蓬一曾借调到中央文革工作了约两个月，与李讷认识。孙为烈士子弟，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是一直性之人，为人耿直，脾气火爆，敢于直言，人称“孙大炮”，故李讷也称他为“孙大炮”。接着便同孙及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李讷问孙：聂元梓呢，到哪里去了？孙答曰：大概到市里开会去了。随后李讷便询问北大的运动情况。孙蓬一作较为详细汇报，其他人也七嘴八舌补充了一些情况。李讷听罢沉默了片刻，接着便发表了一通意见。大意是说：北大的造反派不要只着眼于北大的运动，目前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还未发动起来，造反派受压，尤其上海造反派压力很大，希望北大的造反派去支持他们。李讷说，今天来找聂元梓就是要同她谈这个问题，这是主席的意思。“这是主席的意思”，此话给笔者的印象最为深刻。谈话到此时，已接近午饭时间，孙蓬一要李讷留饭，李说好啊，我可未带粮票。于是众人便拿着饭盒、饭盆到大饭厅打饭，菜是普通的大锅菜，主食有馒头、大饼之类。那时李讷较为朴素，平易近人，在办公室同众人进餐时有说有笑，给大家留下了好印象。

当天下午，李讷与聂元梓单独长谈。她们究竟谈了些什么，聂未作详细传达，只是说毛主席要她带人去上海串连，支持上海的造反派。还说李讷告诉她如果毛主席批准，她也与聂同去上海。校文革常委们原本不同意聂元梓离校，但听了聂的传达后态度大变，均很兴奋，认为这是伟大领袖交给的任务，是对聂元梓和北大造反派的极大信任。经研究决定，由聂元梓、孙蓬一带队，另有校文革组织组的陈某和傅某参加，此二人均为女性，兼有照顾聂元梓的任务。聂随将此名单报告李讷。不几日中央文革办事组送来了北京至上海的4张软卧车票（系一个软卧包厢）。聂孙一行随即赶往上海。至于他们在上海进行了什么活动，笔者只有耳闻，未知其详。

.....

聂元梓等人自沪返京后，中央文革办事组通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尽快将办事组垫付的聂元梓等人赴沪的四张软卧车票款送还他们，以便结账。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回答说：这四张软卧车票是你们给买的，北大无法报销，理应由你们负责。对方很快回话，说聂元梓等四人的编制不在中央文革而在北大，只能归北大报销，并连连催促北大报销后尽快还钱。北大校文革办公室要他们写一证明：四张软卧车票系中央文革办事组给买的，可以报销。但对方予以拒绝。此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最高领袖和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既要派聂元梓以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希图“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见《王力反思录》第758页），又要掩盖聂此行是奉旨行事，真可谓费尽心机。根据当时的财务制度，只有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方能乘坐软卧。聂元梓是12级，报销不成问题。但其他三人皆为一般教师和干部，只能按硬卧报销。差额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彼时中央文革办事组又频频催促还款，无奈，聂元梓只好自掏腰包补齐差额，还钱了事。

江青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王力、关锋找我们五六个人（我记得有孙蓬一、夏剑豸、李清崑、杨文娴、李玉英），到政协礼堂小会议室谈话，询问有关砸校刊的情况，并问这件事是不是张恩慈背后支持，我们说未发现张恩慈与此事有关。他们要校文革写一份有关砸校刊情况的材料上报中央文革。我说我要到上海串连，而且是李讷来校转告我，是毛主席同意并指示的。我也把李讷来校找我的情况，说给了王力和关锋，还说孙蓬一等人同我一块去，李清崑协助姜同光在校主持工作，材料我不能亲自写了。我们当即商定李清崑、杨文娴负责写。我还问我走后，材料写成怎么交给他们。王力说，由校文革送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可。



十四日晚上，我在校内开会，讨论王力、关锋让写材料的内容，以及我和孙蓬一等人准备去上海串连的事宜。会后，九点多钟，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叫你带上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材料，今晚住到另一地方去。我问为什么，王广宇说，不知道。我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王广宇说，不知道，首长没有说。当时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说为了我的安全，难道出了什么情况？

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想了半天想不明白，我就说我不去，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我没有必要去。王广宇说，接你是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我坚持不去，因为王广宇没有说接我出来住的原因。争执了很久，王广宇最后带强制性地，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的指示。我被迫答应了，但说今晚不行，我必须告诉校文革常委，工作也需要安排，否则他们找不到我，还以为我突然失踪了。王广宇同意了，改为第二天接我。后来，我提出到彼此都认识的中宣部工作人员阮铭家里，他家住在中宣部后院。王广宇说，那你就按约定时间在阮铭家里等候，我们的汽车到了，不进他家，就按几声喇叭，你听到汽车喇叭响就出来。

第二天，我先到了阮铭家。当时，阮铭和夫人阮若英在家，教育部的陆善功也在那里。我对阮铭讲，李讷到北大来转告我，毛主席指示我去上海串连，我还动员阮铭和我们一起去上海去。拉阮铭去，是想着人多势众，而且我很看重阮铭的才干。我再三劝说，阮铭才说他当下去不了，随后再去上海吧。他还说，就是要到上海去，也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我和阮铭讲这番话，陆善功和阮若英都在场听到了。这时，王广宇到了，阮铭和陆善功他们送我到院子里，我就出来上了车。在车上，我又对王广宇讲述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串连的事。

王广宇把我带到花园村附近的一个中央文革招待所——当时中央文革调了很多记者搞动态，这个招待所就是这些记者住的。王广宇究竟要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我在车上问了几次，他都没有告诉我。到了记者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后来，还是问食堂的厨师，才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招待所。

王广宇把我送到招待所楼下的一间房子里，他问我，你都带些什么材料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带来了？我告诉他，所有的材料都在这里了。我把材料递给他，他就把这些材料都包起来，用事先准备好的封条封起来，说是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替我保存起来，我什么时候要用，就随时找他好了。于是，我把材料交给了王广宇。

这些材料是：

- 1、揭发陆平同彭真的关系，同旧市委的关系；
- 2、安子文与邓觉先等人的材料；
- 3、安子文、薄一波等人的材料；
- 4、王任重的材料。

他安排我住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这栋楼空空荡荡，楼上的每一个房间都摆着几张床铺，可就是没有人住。他告诉我，吃饭在楼对面的食堂，自己买饭票，不要随便出去，即使是在院子里，也不要随便走动，也不要给外面的人打电话，连家里的电话也不要打。

冷冷清清地住了两天，偌大一栋楼只住我一个人。我心里猜测，江青怀疑我和王任重的关系，她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带过来，是要通过文字查我和王任重的关系（当时正是王任重出事之后）。

关于这些材料，过了两年，江青还有一段继续骗人的话。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凌晨，江青、陈伯达同我谈话时，江青说，你那包材料都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搞走

了，你不要再跟我们要了。两年过去了，她还谈及此事，实际上材料还在中央文革，还在她的手里。

我住在中央文革招待所，行动受到限制，无所事事，心中充满了焦虑。学校的运动和到上海串连的事情，都令我牵挂。我很想知道，让我住进这个招待所到底为什么。后来李讷来了招待所，我就问她，毛主席和江青对北大有什么说法，有什么意见？李讷说，他们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这些问题。李讷只问了我们到上海去串连准备好了没有，我没有多谈，只告诉她，有谁同我一道去上海。从李讷那里没有探明虚实，我就给王广宇打电话，坚决要求离开。王广宇说要请示首长，他经过请示，他们同意我离开那个招待所。

总之，在为去上海串连作准备期间，我先后对校文革全体成员传达李讷带来的毛主席指示，并安排执行，此外还对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王广宇以及校内外有关的人如姜同光和校文革常委及李清崑、杨文娴、夏剑豸、李玉英、傅治文、陈葆华、阮铭、阮若英、陆善功等近二十余人讲过此事，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在我被拘捕后的预审中，陈预审员说李讷否定了是她转告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他始终没有拿出李讷否定的文字材料。这决不是李讷的一句话就能全然否定的，也不是陈预审员说王力的一句话（说去上海串连是江青指示的证明）就可以全然否定的。

在离开花园村招待所之前，十六日晚上，王力来花园村招待所看过我一次。他来是为我住进花园村招待所一事做个了结，因为那么急的要我必须离开家，住到另一个地方来，我一来住了几天，没有任何人来见我说明来意，我还住在这里干什么。我要走了，自然应该派人来照个面。而不是像他后来所言，他来是按江青授意，指派我到上海去的（陈预审员讲这是王力揭发）。他明明已经知道我要到上海去，而且即将成行——我在政协礼堂对他讲过了，他何必再这么讲呢。王力来了，只对我说，你们是群众团体，你们到上海不要打中央文革的旗号，你到上海串连主要是你们自己的行动，有急事可以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有事情可以找上海记者站的记者甄文君，他也可以帮助你们提供点运动的情况。因为你们是群众组织出去串连，就是找甄文君，也要注意方式。王力这些指示，我离开花园村以后，对北大的校文革成员和一些比较熟悉的人都讲了。但我认为江青要对我进行审查的事情，我不能讲。情况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也说不清楚。

关于我去上海串连的事，《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第三版第504～506页有如下文字：

现在历史学家、纪实文学家说聂元梓和张春桥早有勾结，有计划、有组织地用聂元梓轰上海市委，一切都是预谋的、有计划的，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没有那么高的预见。

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办的，我比较清楚。那时我兼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十一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里，说得到可靠的情报，有人要绑架聂元梓，而且时间就在今天夜里。她说她报告了主席，主席意思要立刻找到聂元梓，在中央文革小组把她保护起来。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马上请王广宇，要他立即找到聂元梓，他说找不到，我叫他开个车到处找，一定要找到。王广宇很晚才找到聂元梓，安排她住在快报组（花园村）。下半夜我和徐学增到花园村找到聂元梓，传达江青意见，叫她住着休息几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电话。她有时也出去，晚上回来住。这期间正好发生安亭事件，陶铸受到毛主席批评。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说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到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要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过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陈伯达找到阮

铭。这个北京和上海联系的组织，没牵涉到张春桥。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转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 and 北大，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到上海。她不能打中央文革的旗号，完全作为北大聂元梓领导的群众组织的身份到上海去做些观察、联络工作，没有说她的任务是把上海市委打倒。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她在上海的生活安排可由上海记者站照顾。现在历史学家、纪实文学家说聂元梓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见面，搞什么阴谋，聂元梓在上海的行动是张春桥策划的，他俩怎么说，作者都听见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春桥对聂元梓非常反感，张春桥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聂元梓为什么打着中央文革旗号？为什么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讲了毛主席指示的几条，我说没交代她有事去问张春桥，是因为张春桥要回来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她只是代表北大群众组织去进行串联。没有叫她打着中央文革旗号。

《王力反思录》中讲到的主要情况是符合事实的。有些具体情节可能因为时间过久，记不清楚了，所以和我说的情况不完全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他说我是十一月十四日下半夜（即十五日凌晨）被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而且说“我和徐学增到花园村找到聂元梓，传达江青意见，叫她住着休息几天……”，如果王力和徐学增下半夜向我这么讲，我就不会怀疑是江青审查我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王力和我回忆的都有出入。比如说我写过一张对上海市委的大字报，“聂元梓自称这是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写过这张大字报，也没有说过这是“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北大学生们写的，当江青等人到北大开会时，他们叫我在主席台上转交给江青的。还有其他一些细节也有出入。因为这些出入都不是大的原则问题，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王力反思录》所讲的证明我住花园村记者站和上海串连都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 ◇ 上海纪行

我和孙蓬一等人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到达上海，十二月十六日我先期回到北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本来还要从上海到广州等地去串连，因为学校的事情走不开，我就从上海直接回北京了。

我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一些活动，反对上海市长曹获秋。毛主席没有具体指示要我去反对曹获秋；可是，我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群众正在炮打曹获秋，说他是走资派，这一点毛主席是清楚的。到上海市“一月夺权”的时候，毛主席不是也批准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打倒曹获秋的行动吗？我要是不赞成造反派反对曹获秋，那就不合乎情理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干什么来了？因此，我到了上海，就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炮打陈丕显、曹获秋。我参加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批判曹获秋的大会，并且提倡要群众向党中央请求改组上海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是因为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被党中央改组了吗？我们到上海，没有想到要夺上海市委的权。那时候夺权运动还没有开始呢。我们也没有“夺权”这样的思想，没有这样的“斗争水平”。所谓夺权，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由上海王洪文等人首先发起的。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们怎么会想到要夺权呢？要夺权，我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夺权？而且，为什么从上海回北京后，也没有到北京市委、教育部等去夺权，为什么后来不但远远地落在上海造反派后面，还对北京市的夺权采取消极态度呢？（当时，北大没有参加北京市夺权委员会）这从逻辑上也说不通。相反地，我们根本没有夺权的野心，在群众大会上也只是提出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熟悉当年历史的人都知道，改组和夺权根本是两回事，改组是由党中央决定的，由新任命的干部接替旧的领导班子，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就是被党中央毛主席改组的嘛。当然，因为我在文革初期的特殊身份，我这么一讲，批判曹获秋，对于上海的群众，影响就很大。我说曹获秋是走资派，这自然会给他造成很大压力。

但是，历史地看问题，我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没有多少我自己的“独创”，这都是当时的大趋势，向当权派开火，炮打司令部，各级司令部都要用炮轰一轰，这是符合当时的“十六条”的，也符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精神的。而且，北京到外地串连的师生，在各省市都是这么做的。

我在上海期间，先后见到了张春桥和王洪文。我找张春桥谈话目的有两个：第一，我们是应毛主席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指示来上海的，应该向上海市委打招呼。张春桥既是上海市委的，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所以应该首先对他而不是别人说明来意。第二，了解上海发动群众的情况和意见。我同张春桥谈话开始就说明了来意，是毛主席让我们来串连的。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具体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张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来了就好。张说他不在上海，去处理安亭事件了，他首先谈了事件处理的情况，表扬工人怎样听党的话，接受劝阻，不上北京请愿了，决定回上海闹“革命”。然后他说，上海工人运动发动得好，学生较差。你们来了，要看看上海运动的特点（街头辩论）。我告诉他，我们来后参加了群众大会。张说，你们也要到下边群众中去看看，向工人学习。我说，我们提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是否可以？张表示可以。张又说，曹发动群众不力，还说曹有什么事都与陈丕显商量，最后决定问题还是陈。我说，陈不是很早就参加长征的红小鬼吗？张说，有的干部不也是过去为党做过许多工作，现在“修”了吗？后来，张问我住在什么地方，听说魏文伯让你住在某某饭店？张的意思是我不要在那里住。我说，我准备住在接待站安排的地方。张表示要给我找地方住，我拒绝了。

我和张春桥的全部谈话内容就是这些，没有不可告人的。而且张春桥俨然以党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对待我，我与他又是第一次谈话（也是仅有的一次），也感到拘束。谈话约一个多小时。甄文君后来否认参加谈话，是有思想顾虑的（法庭没有给我看甄文君否认的证词），他知道张春桥说了陈丕显的坏话，我没有完全听进去，所以，后来他又叫傅治文转告我和孙蓬一，“曹荻秋是前台，陈丕显是后台，要揭发陈丕显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参加谈话，不知道张的态度，他是不敢这么做的。

张春桥要我到工人中间去学习，因此，我后来找了当时担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的王洪文和潘国平，跟他们谈过联合起来批判曹荻秋，造上海市委的反。对王洪文，我就见过一次面，印象虽然不够好，但也没有留下什么更多的印象。我们曾经到上海的工厂参观和串连过，支持他们反对曹荻秋等。这些就是我在上海活动的全部经过。

向常溪萍同志深刻致歉

我到上海串连，最令我痛悔的就是参加了对常溪萍的批斗，给常溪萍同志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尽管常溪萍被迫害致死已30余年，但是，我愿意在这里真诚地表达我对他的深刻歉意，愿意作出认真忏悔。

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工作队到北大来，是秉承党中央的旨意来的。其实，这和当年的反右一样，也是高层领导出面，动员大家给上级党委提意见。建国以后的每次运动，似乎都是这样开始的，我自己呢，因为参加革命早，思想单纯，对于党内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领悟较少，许多时候都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生活，看待党的事业。这从前面所讲，我在安子文问题上主动采取的向党组织汇报的做法，就可以看出来，我是一贯如此。

回想起来，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我是两头不沾边，——我当时是在哈尔滨市委工作，人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既没有参加哈尔滨市的帮助党整风，给各级领导和党委提意见，又没有参加人民大学大鸣大放。否则，以我这种直率的性格，准会把平日里积累起来的对上级机关和领导的各种看法和意见一下子倒出来，那还不是划右派一划一个准，我准是

个大右派。记得当时，是人民大学的肖前教授辅导我学哲学，他给我上辅导课，关于反右派的事情，他是反对划右派的，更多的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我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做任何解释。

这样，我对反右派斗争就没有多少亲身经历，没有能够从中汲取什么教训。这一次，党中央书记处决定北大搞社教运动。张磐石带领工作队到北大来，动员我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我就上当了，被利用了。我相信了他的话，讲了真话，可是我给陆平提的都是具体工作中的意见，张磐石就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把北大当作是“烂掉了”的单位，把北大校园里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得非常严重。常溪萍对他的批评就是，第一，张磐石搞家长制，没有民主作风；第二，张磐石太左了，把北大问题看得严重得很。常溪萍的批评，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常溪萍的这些正确认识。他们在工作队领导内部争论，我们在下边的小干部并不知情。

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校长。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的党委副书记、副队长。常溪萍一进校，本来是与张磐石的立场相一致的，他同样出面动员过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后来常溪萍改变了立场，我们就认为他是“叛徒”“出卖”了工作队和北大的社教运动。因此，“文革”初期，在批判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同时，人们自然地会想到当年的常溪萍，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干将”，是社教运动的“叛徒”。这给常溪萍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在北京大学开全校大会，参加中央全会的各大区和省市领导人，华东局的陈丕显，西南局的李井泉，等等，都到北大来，“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事先，北大有人给常溪萍写了一份大字报，这我是不知情的，我没有参与，也不清楚参与者是谁。在召开全校大会的时候，在会场上，他们把大字报交给我，要求我把大字报转交给江青。当时我也不可能仔细看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在会场上，我就把这张大字报转交给江青。江青又把大字报交给陈丕显，要他带回上海贴出来。后来许多人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我写的，有人说我自己讲这张大字报是我写的，还说这是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不是事实。但是在思想上，我当时确实是反对常溪萍的。他先动员我们反陆平，后又说批陆平错了，结果他受到表扬，我们却挨整。我反对陆平，批判陆平，自然也是反常溪萍的。我到上海串连的时候，就住在华东师大。我们和华东师大的学生联合开会，批斗常溪萍，我在批斗大会上发了言。师大的学生说他是走资派，我主要讲他在北大社教运动的情况，说他是北大社教运动的“叛徒”。我的发言，以及对常溪萍的态度，都是非常错误，给常溪萍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常溪萍死于一九六七年，是被张春桥迫害而死，这个责任不应由我承担。

后来听到别人说，常溪萍在工作队撤离北大的时候，曾经提出，不要因为社教运动的转折而批判前一阶段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的积极分子。常溪萍批评张磐石的两条意见都是对的，他要求保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的意见也是正确的。而彭真却说：“有人讲不要批给陆平提意见的积极分子，说是批不得；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不得？”想到这一点，我内心的负疚感就更沉重了。由于我的幼稚，我的错误，给常溪萍同志造成的伤害，让我抱憾终身。我愿意在这里再次对常溪萍同志表示我的歉意。

#### ◇ 江青的指责

我回北京以后，见到了王力。这是从上海回来两三天的事。因为我到上海以前，王力跟我见过面，现在从上海回来了，也应该向王力汇报汇报。当时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就

找了他，向他汇报了上海串连的情况。他没有具体说什么，只说你们到上海还是进行了许多宣传活动的，等等。汇报完毕，我就回学校了。

同样，我也向李讷汇报了上海之行。她批评我们说，你们到上海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团”，而是叫“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当时，北京西城区有一个具有“保守”倾向的群众组织叫作“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李讷批评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也叫“捍卫团”，容易与保守派混淆起来。

这段时间，我还见过江青一次，并且受到她的严厉指责。这是在中央文革接见北京高校红卫兵的头头的时候，开会以前，她先找了我，把我找到另一个房子里。江青批评我说，你们到上海去串连，为什么说是中央文革指使的？我说，我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是毛主席派我们到上海，我们有什么必要打中央文革的旗号呢？

不过，上海有些不知内情却又非常“有判断力”的人，的确以为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遣的，陈丕显就这样看。那时候，上海的运动还没有波及到陈丕显。我在上海见到了他，我和孙蓬一找陈丕显谈过一次话，陈丕显就问，你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吧？我坚决否认，我们是群众嘛，没有什么人派我们来，我们自己要来——我们心里是理直气壮，是毛主席派我们到上海；但是，李讷既然没有说明，我们也不能公开张扬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陈丕显看得很明白，他说，你是接受了指示来的。不过，他不知道我是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才到上海的，他也不会这样想，他以为我是接受了中央文革的指示，到上海造反来的。这大约也是后来指责我到上海煽风点火的原因之一。

□ 摘自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